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微博谣言的 流播特征分析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陈登航¹ 汤书昆^{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 合肥 230026)¹

(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 合肥 230026)²

[摘要] 以新浪官方辟谣账号“微博辟谣”2020年1月19日至2月19日的辟谣内容为样本, 构建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素材案例库; 利用质性软件Nvivo进行编码与分析, 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谣言传播具有明显的本土化语境特征、高度的可复制性, 并出现“伪行政权力”的流播特征。综合前人研究并结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性, 提出改进辟谣信息的传播方式、更新辟谣信息的表达策略, 以及建立与谣言流播主体的对话机制, 以促进风险社会语境下社会秩序的重建和社会信任的修复。

[关键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微博谣言 流播特征 辟谣 新冠肺炎

[中图分类号] G206.3; N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21.01.005

1 研究背景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

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 (Gordon Allport) 所言: “从未有一场骚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重大性和突发性, 导致社会在结构性压力、信息不对称和恐惧心理笼罩之下, 成为

滋生谣言的温床。谣言在信息数字化时代传播短、平、快特征日益显现的趋势下, 得以在虚拟空间迅速蔓延, 并即时作用于现实环境, 给政府和专业机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巨大困难。

当下, 国内学者对突发事件网络谣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谣言特点分析和谣言传播模式的建构。例如, 霍良安等分析了在突发事件中谣言的扩散机理与谣言扩散的影响因素^[3]; 王灿发对突发公共事件谣言程度公式进行了建

收稿日期: 2020-06-29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文科应急课题“新冠病毒疫情应急科普的传媒报道大数据调查”(YJ2020211001)。

* 作者简介: 汤书昆, 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教授, 研究方向: 科学传播、知识管理, E-mail: sktang@ustc.edu.cn。

构,并结合不同类型事件建立了相应的谣言传播模式^[4]。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综合多个事件的定量分析,如汪青云等基于 2010—2014 年 40 个突发事件进行了分析^[5],也有基于个案如日本“3·11”大地震、中国温州动车事故等的定性研究。

学者们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谣言研究延续了突发事件的研究传统,在检索到的期刊论文中,代表性的如匡文波等分析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的传播机制,并构建了新的谣言传播模型^[6];陈雅赛和王灿发等细分了谣言的传播过程,分析了谣言传播的阶段性特征^[7-8];翁士洪等基于 H7N9 禽流感事件中的微博谣言,详细探讨了微博谣言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的产生机制以及治理对策^[9]。

国内现有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谣言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一是研究体量偏小,2020 年 6 月 20 日在中国知网中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谣言”为主题关键词进行高级搜索,共搜索到 30 篇文献,其中高度相关的仅 10 篇。以近年来出现的 H1N1、H7N9、禽流感、埃博拉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主题词搜索,发现大部分研究集中于硕博论文与会议论文,专门研究的期刊论文较少。二是质性研究占多数,如张琳以“白岩松对话钟南山”为例分析了谣言的传播原因与特点^[10],统计、编码和数据分析等量化手段相对缺乏。三是谣言样本量总体偏小,例如一项基于 2010—2014 年的分析仅涵盖了 47 则关于公共卫生事件的谣言^[5],一项研究新冠肺炎疫情的谣言文本分析也仅有 256 个样本^[7],不足以从大量数据中精准提取信息。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标准》,新冠肺炎为新传染病或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已构成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1]。世界卫生组织

(WHO)总干事谭德塞早前也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新冠肺炎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2]。由于此类事件的重大性和突发性,相关谣言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对其进行专门考查和分析具有必要性与实际意义。基于此,本文将焦点置于 2019 年末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借此探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的内容特征与流播特征,并结合此次疫情的现实经历提出针对性的辟谣手段,为应对将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经验与启示。

2 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新浪官方辟谣账号“微博辟谣”2020 年 1 月 19 日至 2 月 19 日的辟谣内容为样本,进行全样本数据采集。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删除重复和非相关样本后共获得 968 条有效数据,以此建立谣言素材案例库。选取该账号发布的辟谣信息作为数据来源,主要基于以下考量:一是该主体账号在疫情期间积极传播辟谣信息,并联合了全国各地官方微博、地方辟谣平台、地方网警以及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等官方渠道,拥有丰富的谣言数据来源;二是“微博辟谣”作为新浪微博虚假消息辟谣官方账号,具有半官方性质和高公信力,便于快速定性谣言,以区别于普通流言及其他未经证实的信息;三是辟谣信息中包含了造谣者、传谣者的心理动机解析和行政处罚,有助于对谣言进行深层次细致的考查。

2020 年 6 月 15 日,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关键词在百度指数进行搜索趋势检索,发现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15 日为新冠肺炎最受中国公众关注的时期,由于谣言的生长、传播与社会关注程度密切相关,因此该时期也是谣言的集中暴发期,谣言样本量大、类

型丰富。同时该时段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百度搜索指数从零逐渐爬升，前后共历经五个波峰，随后热度渐渐下降，对于考察谣言的流播具有典型性（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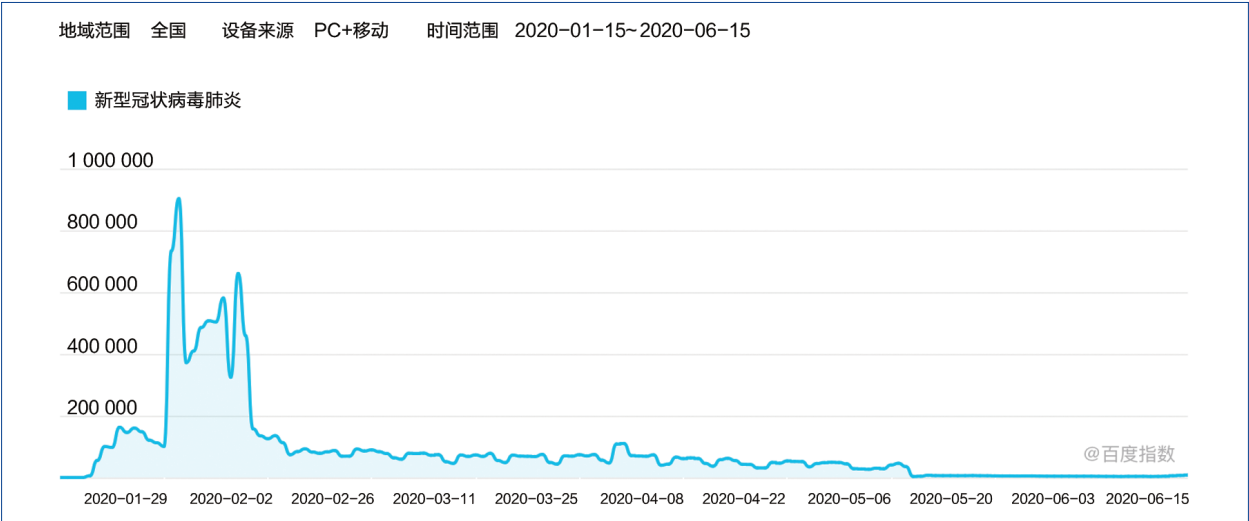


图1 百度指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搜索趋势

注：该数据显示的是互联网用户对关键词的搜索关注程度及持续变化情况。纵坐标为以网民在百度的搜索量为数据基础计算得出的“搜索指数”，横坐标为搜索日期。

将收集到的968条数据导入质性分析软件Nvivo进行编码及可视化分析。国内目前对于谣言的分类没有统一的标准，有学者从社会心理学的利他动机视角出发，将谣言分为利他性谣言、利己性谣言和无利性谣言^[5]；也有学者将谣言分为牢骚性谣言、攻击性谣言、牟利性谣言、宣传性谣言和误解性谣言^[13]。在编码的过程中发现，上述分类与所收集的数据间不具备良好的适应性，因此本文选取一种更为直观的方法，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谣言分为直接谣言与伴生谣言^[3]。直接谣言为与新冠肺炎直接相关的事件，伴生谣言是指由新冠肺炎引发的相关信息及事件。

首先对数据进行开放性编码，仔细审阅、分析，提取与主题相关的关键词建立自由节点。然后进行主轴式编码，对自由节点进行整合与概念化操作，如将“上街”“红灯”等自由节点统一合并为“交通与出行”，共得到13个子节点。最后进行选择式编码，将“生活与物资”“湖北人与武汉人”归类到“伴生谣言”中，最终得到树状节点。Nvivo中的编码节点与示例见表1。

表1 编码节点与示例

一级节点	子节点	自由节点	参考点(个)
直接谣言	病毒	病毒、传播、感染、治疗、抑制	53
	出逃与死亡	逃了、人不见了、逃走、死了、死亡	54
	疑似与感染	感染、疑似、确诊、病例	255
	预防与抵抗	防、预防、对抗、抗病毒	44
伴生谣言	生活与物资	超市、菜场、自来水、菜、生活用品	62
	湖北人与武汉人	湖北籍、武汉人、武汉返乡、武汉来的	34
	口罩与消毒	酒精、口罩、N95、消杀、消毒	122
	交通与出行	封闭、封城、封路、限行、红灯、断油、停运	178
	医院与医护人员	医院、钟南山、医生、护士、医疗队、医疗工作者	41
	复工与开学	复工、开学、复学、正常化	24
	网络与交流	微信群、断网、封号、封群、解散	19
	非典	非典、SARS	3
	其他	—	77

3 研究发现

3.1 新冠肺炎疫情谣言的焦点

通过可视化软件进行词频分析可以发现，此次疫情中的谣言聚焦情况（见图 2）。



图 2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谣言词语云

“病毒”“肺炎”“新型”“武汉”“感染”等词是新冠肺炎疫情中的高频词汇，在谣言案例库中的出现频次均在 100 以上，其中“病毒”一词的加权百分比高达 1.99%。此外，“确诊”“医院”“隔离”“疫情”等词也成为大众所关心的谣言热点。由此可见，公众讨论的焦点与谣言关注的焦点存在高度重合性，有关新冠肺炎的感染、疫情中心区武汉的情况成为谣言聚焦的中心。

利用前期的节点编码进行结构性分析，可以更为清晰地展现谣言的重心（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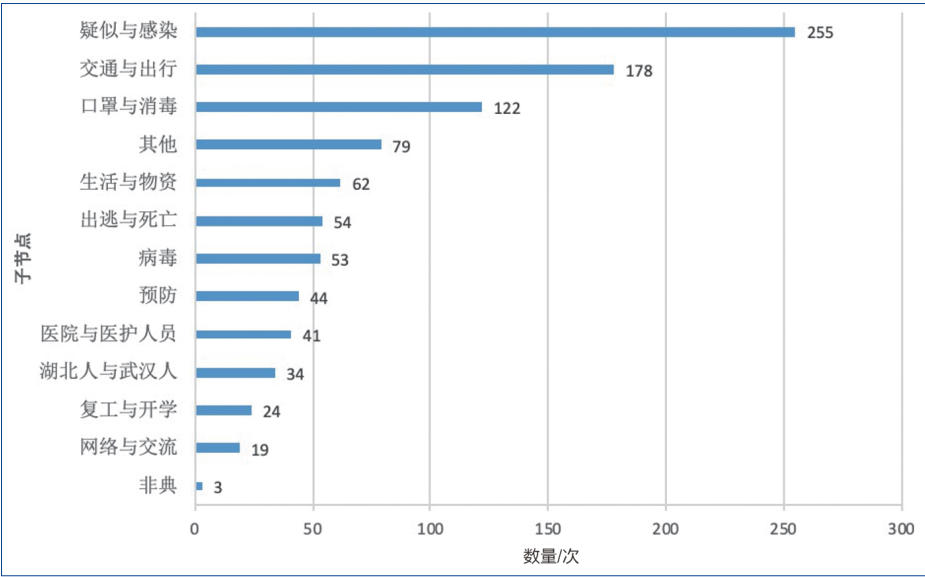


图 3 新冠肺炎疫情谣言子节点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以伴生谣言居多（占比 58.59%）。其中涉及交通与出行的问题最为公众所关注，封城、封路、市内交通停运等成为伴生谣言主力。此外，有关防疫措施与生活物资的谣言也成为传播热点。直接谣言中，关于出现感染和疑似病例的谣言占比最大，也是所有谣言中数量最多的一类，除此之外的其他直接谣言占比不高。

结合既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此次疫情，还可以进一步将上述谣言分为科学类谣言、民生类谣言、传染类谣言和特殊人群谣言。科学类谣言涉及对病毒、预防和抵抗病毒措施的不真实认知，民生类谣言在狭义上主要涉及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生活与需要，传染类谣言则涉及有关病毒的扩散与事件的恶化，特殊人群谣言在此次事件中涉及科学家、医护工作者及湖北人民。总体上看，民生类谣言的数量为四类谣言之最，传染类谣言次之，科学类谣言再次之。这说明在大的突发事件面前，普通民众最为关心的是非正常社会秩序中个体生活的受影响程度，在公众将注意力置于交通出行、生活物资及复工开学等信息之时，相关谣言得以借势传播。科学类谣

言占据一定比例，说明公众认知需要亟待满足以及应急科普的必要性。科学家、医生及最先暴露的地区人民与突发事件直接相关，因而获得普遍的社会关注，成为谣言风暴的次中心。

3.2 新冠肺炎疫情谣言具有鲜明的本地化特征

谣言具有的“新闻性”在特定的情

境之下，发挥着“替代性新闻”（alternative news）的重要作用^[14]。换言之，谣言得以传播在于其存在新闻价值并能够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对谣言案例库分析发现，具有新闻接近性的谣言数量最多，占比达59.74%，其次是具有重要性的谣言，占比19.15%（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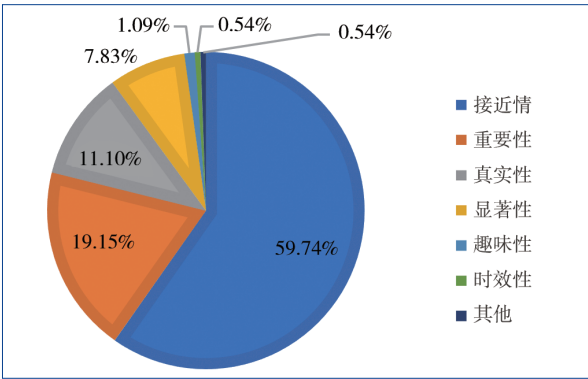


图4 谣言的“新闻价值”分析

谣言呈现出明显的本土化特征，其典型案例出现在子节点“感染与确诊”中，以“某地出现新冠肺炎感染者”为表征的谣言众多，且在全国各地出现不同的流变版本。谣言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谣

言作为“假新闻”也具有同受众在心理与地理上的接近性；二是信息发布不到位，常态化传播渠道失语，非常态化信息传播异常活跃，为谣言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三是公众的心理紧张和情感恐慌在结构性压力下被充分激发，在选择性解读的框架下，现实空间中的蛛丝马迹得以与疫情相勾连，从而使得似是而非的“真相”在虚拟空间中快速

传播扩散。

3.3 新冠肺炎疫情谣言具有伪行政权力特征

谣言作为非官方性的信息活跃在非正式的话语空间，与社会精英和政府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信息形成鲜明对比，且通常被排除在官方的话语空间之外，因而具有天然的“反权力”特质^[7]。而在此次疫情中出现的谣言则表现出了与寻常谣言相异的特征——权力特质，即选择通过官方立场以官方口吻发布以假乱真的虚假信息。由于发布通知属于行政命令权，而谣言流播中的“通知”发布主体并非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根本目标也不是通过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令和各类政策来有效地实现国家意志，因此具有权力特质的新冠肺炎疫情谣言实际上具有一种极富迷惑性的伪行政权力特征（见表2）。

表2 部分具有伪行政权力特征的谣言

发布时间	谣言内容	谣言形式
2020年1月26日	南京自2020年1月27日0时起交通停运全面封城	通知
2020年1月26日	落地签可以续签15天，旅游签续签60天	通知
2020年2月4日	武汉各区域管部门将于2020年2月5日凌晨开展消毒	通知
2020年2月6日	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延迟企业复工上班的通知	通知
2020年2月6日	昆明市2020年2月7日中午全部封路	通知
2020年2月6日	玉林政府关于外来车辆、人员一律不准入村等的通知	通知
2020年2月8日	东兰县2020年2月8日0时起实施防控措施的通告	通知
2020年2月8日	田阳县紧急会议精神要求	通知
2020年2月12日	代县人民政府发布最新通告	通知
2020年2月14日	邵阳市紧急通知	通知
2020年2月17日	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开学工作安排情况汇报	会议讨论稿

例如，2020年1月26号，贺州网警发布关于“贺州发布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指挥部令1号令”的辟谣信息，该谣言不仅以该地防控指挥部的身份发布，且信息发布内容与行文极具官方色彩，使许多民众难辨真假。谣言是“二手的白日梦”，是个人情绪状态反映在周围事物解释中的“投射”^[2]。在官方及时发布缺位的情形下，谣言代替官方发布

信息，满足公众对于信息的渴求，甚至迫使官方开口，以扭曲的传播压迫官方尽“未尽之职”，从而裹上权力的外衣。

由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谣言从对官方话语权的挑战演变为对官方话语权的介入和权力的替代性使用，从反权力特质演化为解构官方的伪权力特质。谣言戴上权力的假面，以确定性代替传统谣言的模糊性，以官方性代替传统谣言的非官方性，以“伪真实性”

代替传统谣言的虚假性，大大增强了信源可信度和谣言真实度（authenticity grade），使谣言得以在大范围内广泛流布。

3.4 新冠肺炎疫情谣言的可复制性高

在对谣言素材案例库的分析中还发现，新冠肺炎疫情谣言具有高度的可复制性。此类谣言在内容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往往是对某地的谣言稍作修改转而成为另一个地区的谣言，并在全国各地相继出现（见表 3）。

表 3 几种典型的可复制性谣言与出现地区

谣言主题	代表性谣言	流播地区
酒精引发爆炸	上海奉贤一男子在家喷酒精突然爆炸	成都、邵阳、武汉、宁波、南京……
全城开红灯	邵阳市各城区内所有路口红绿灯，统一 24 小时改红灯	十堰、聊城、临沂、汾西、肇州、湘潭、台州、铜陵、无锡、陇南、泉州、江油、西安、绵阳、泸州…
开学	成都将于 2020 年 3 月 2 日起分批开学	北京、重庆、绵阳、上海、杭州、合肥、淄博、长春、西安、福州、临沂……
自来水加氯需静置 2 小时再用	大连自来水里加氯气，最好放 2 小时再用	南京、郑州、台州、武汉、潍坊、无锡、佛山、天津、泰安、莆田、徐州、重庆、海口、临汾……
乘公交需身份证	南京乘公交要带身份证	北京、成都、太原、哈尔滨、重庆、长沙、泸州……
封城	杭州于 2020 年 1 月 26 日中午 12 点开始封城	宁波、福州、广安、福清、绵阳、青岛、襄阳……
飞机大面积消毒	2020 年 1 月 3 日会在武汉上空开始播撒消毒粉液	北京、郑州、莆田、淄博、乌鲁木齐、潮汕、成都、合肥、杭州、福州、大连、长沙、宜昌……
封群	市公安局网络中心将封停在微信群发布新冠肺炎信息的账号，包括微信群及群主，永不解冻	宜昌、丽水、蚌埠、嘉兴、益阳、南昌、鹰潭、泉州……

奥尔波特（G. W. Allport）和波斯特曼（L. J. Postman）曾揭露谣言再造的三种嵌入机制，分别是削平、同化和磨尖^[15]，这种高度的可复制性可以被视为三种嵌入机制复合而成的特殊畸变，其中既有对不合理信息的舍弃（削平），又有选择有限背景材料细节加以记忆（同化），以及根据群体习惯对信息进行选择性再造（磨尖）的过程。谣言在这三种嵌入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以大体一致的内容呈现在不同地区的公众面前。

谣言的畸变还与此次疫情的特殊性有关，为了防止人群交叉感染，国内自 2020 年 1 月 22 日起就呼吁公众居家少出门^[16]，网络尤其是社交软件成为疫情期间公众交流信息的主战场，传统谣言传播的现实人际网络退居其

次。在网络技术高速发展和公众心理高度紧张的合力下，出现同一谣言在不同地区相继引起波澜的快速流播特征。

4 讨论与分析

现阶段“微博辟谣”的辟谣能力不足，其认证主页显示粉丝量为 186 万，而其辟谣文章的微博传播指数（BCI）相较之下却很低。以辟谣数量最多的 2020 年 2 月 8 日为例，当天共发布新冠肺炎疫情辟谣微博 47 条，绝大部分微博的转发数、评论数、点赞数均为个位数。根据微博传播指数（V9.0）公式计算出当日的指数仅为 364.83^[17]，类似的情况在同类微博辟谣主体账号中同样存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谣言流播不仅造

成信息环境中信息熵的增大,而且还易引起社会失序。在此次疫情中,出现了多地民众因担忧生活物资缺乏而“抢米”造成的人群聚集现象,对疫情防控造成很大威胁。目前学者们关于辟谣的研究,有的从宏观网络谣言治理机制着手,有的从辟谣主体、辟谣时机、辟谣内容和辟谣渠道等提出相应策略,但都缺乏可操作性强的手段。本文基于上述分析,着重从操作层面入手,尝试提出以下应对措施,以期改善当前辟谣行动的尴尬被动局面。

4.1 改进辟谣信息的传播方式

借助算法分发、区块链等前沿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精准辟谣。目前针对疫情信息的辟谣,已有部分平台如腾讯较真、丁香园等上线了疫情辟谣专栏,但此类平台收录的谣言不仅具有滞后性,且不能满足公众对于本地化谣言的辨别需求。同时,对于疫情中出现的可复制性高的谣言,本次疫情中采用的反复辟谣方式,大大消耗了人力成本,加重了一线辟谣人员的工作负担,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具有媒体属性的平台基于空间位置 and 用户画像,精准投放辟谣信息,同时联合专业性网络辟谣平台,如果壳网、科学松鼠会等形成有组织的辟谣力量进行信息发布。以“今日头条”为例,其借助智能分发算法,将特定辟谣信息推荐给目标受众,以更加便捷、快速的方式帮助人们免受谣言蛊惑。

其次,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可溯源性,快速锁定谣言的传播源、传播中介等多级传播主体,通过机器嵌入文本实现精准辟谣、通知、警告和教育。充分发挥技术优势,降低多方辟谣主体的时间侵占并缩短辟谣时间间隔。

最后,建立辟谣素材案例库,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社交媒体上出现的信息进行定向标记,提示用户该消息可能为谣言,并为其提供举报与举证入口,提高用户对谣言的警

惕心和辨别能力。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家戴维·拉普(David N. Rapp)曾提出:要避免人们对不准确的信息进行编码,并鼓励将这些跟踪标记为“有问题的”^[18]。在受众把错误信息编码进自我认知之前,提示人们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重新思考,降低谣言的命中率。

4.2 更新辟谣信息的表达策略

摒弃传统的辟谣方式,改变辟谣信息的呈现与组织方式。目前的辟谣信息呈现方式,各地网警或辟谣者在文字内容的措辞和组织上大同小异,图片内容多是截图的简单堆砌。长期静态化、模式化的表达逻辑在抑制了辟谣效果的同时,也抑制了公众的再传播意愿,与互联网和社交媒介的网民传播特征明显背离。因此改进既往的辟谣表达策略十分必要。

首先,利用短视频、动画等动态表达进行辟谣。艾瑞 iUserTracker 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0月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5亿^[19],行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辟谣信息的呈现方式明显滞后于受众阅读习惯的演进。随着5G时代的到来,短视频将成为信息呈现与交互消费的主要方式,辟谣信息应根据受众的信息获取需要,结合动画、图片、文字说明,辅以同期声解说,以更加简单、直观、动态化的视觉逻辑方式对谣言进行否定式解读,满足受众的碎片化阅读习惯和轻量化的思维习惯。例如,科普自媒体“回形针 PaperClip”正是借助短视频的形式,于2020年2月2日发布“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对新冠肺炎的发生、感染和传播做了清晰、直观的说明而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当期视频全网播放量超1亿,带来了320万的粉丝增量^[20],一度成为炙手可热的短视频自媒体。

其次,应借助互联网的话语风格改进话语表达传递方式。诸多具有伪权力特质的通知类谣言正是借助了官方发言套路化、格式

化的特点，伪造文书导致公众难辨真假。因此有必要改进辟谣的表达方式，与互联网话语的表达风格和表达逻辑挂钩。例如，2020年1月26日，“温州网警执法”在发布一则关于“网民扬言感染他人”的辟谣信息中，就以温小巡的乖萌形象提醒网友们“猥琐发育，别浪”，呼吁网友们对言行负责。其可取之处在于摒弃官方行文，借助游戏用语，以贴近公众日常生活与互联网话语风格进行精准表达，既诙谐有趣地否定了谣言，又起到了警示和提高网民信息素养的积极作用。

4.3 建立与谣言流播主体的对话机制

谣言通常是弱者的武器，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折射着公众的认知需求与情绪高压。因此在辟谣实践中，关注谣言背后的情绪与心理状态、建立与谣言流播主体的对话机制、疏导社会情绪并修复社会信任十分重要。

对平台而言，社交网络上的信息应疏堵并举，过多屏蔽、删帖行为虽是平台所为，却容易让权力机关成为“替罪羊”，引发公众与官方的对立，可以考虑在一定程度上、一定传播场域内允许谣言作为发泄情绪和寻求问题解决对策的工具。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就提出：一定条件下的社会冲突能够保持社会的持续性，防止两极对立的产生，提高非常态社会状态下公众的适应性，并促进社会整合^[21]。对媒体而言，适当突出建设性新闻对特殊社会状态的“建设”意义，发挥新闻媒体的“社会黏合剂”作用，以专业媒体独有的冷静、客观的方式引导公众。对政府而言，实时关注舆情，适时总结并进行自我危机公关，修复社会信任。例如在李文亮事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最先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对“武汉市公安机关处罚8名吹哨人”给予从法律层面的社会思考，随后国家监察委员会派遣调查组赴武汉进行全面调查并于2020年3月9日公布通

报，回应公众呼声，及时发出了权威部门的声音，有效排解了公众的疑虑，避免了信任鸿沟的加深。

5 结语

本文聚焦新冠肺炎疫情，首先，从谣言文本的内在视角出发，着重分析谣言深层的内容特征而非外在的时间、主体等传播特征；其次，摒弃纯质性的思辨分析，借助编码和文本分析手段，基于大量谣言样本深入分析谣言在大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呈现的新特征；最后，放弃宏观视角上对辟谣战略的分析，从微观角度提出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的操作化建议，以期对日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谣言应对和治理有所裨益。

谣言的流播将长久存在于社会之中，除上述微观层面的手段外，有必要建立辟谣的常态化机制，形成政府、学术机构、市场化科普平台和媒体之间的联动，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特殊情形下启用应急辟谣机制，避免机制缺失遭遇突发事件的尴尬局面。同时，多元主体在日常工作和辟谣应对中，应当形成和注重自身的社会公信力，以期在应急状态下更好地发挥辟谣功能。

此外，造谣和辟谣的斗争在本质上是争取受众的过程，受众的信息识别能力与信息批判能力对于减轻辟谣工作负担大有助益，因此，需要通过结构化的手段提高公众的信息素养。例如在大学、中小学开设信息素养相关公共或选修课程；上线“学习强国”平台新媒体素养任务并以学分进行相应激励；将造谣者、造谣者与企业挂钩并增设企业舆情负面清单制度，倒逼企业提升员工的媒介素养。由此增强公众对谣言的识别能力，并激发广大公众参与到扼杀谣言流播的过程中，提高公众的社会参与感、获得感，增强社会黏性。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EB/OL]. (2008-03-28) [2020-03-25].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6399.htm.
- [2] 奥尔波特等. 谣言心理学 [M]. 刘水平, 梁元元, 黄鹂, 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141-143.
- [3] 霍良安, 黄培清. 突发事件中的谣言扩散问题研究——以日本大地震为例 [J]. 情报杂志, 2011, 30(10): 77-81, 85.
- [4] 王灿发. 突发公共事件的谣言传播模式建构及消解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0(6): 45-48.
- [5] 汪青云, 童玲. 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特征分析——基于2010—2014年间网络谣言的研究 [J]. 新闻知识, 2015(6): 6-8.
- [6] 匡文波, 武晓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模型及特征研究 [J]. 新闻与写作, 2020(4): 83-87.
- [7] 陈雅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传播与治理研究——基于新冠疫情的网络谣言文本分析 [J]. 电子政务, 2020(6): 2-11.
- [8] 王灿发, 于印珠. 新冠肺炎疫情中谣言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及辟谣策略探析 [J]. 中国报业, 2020(7): 16-19.
- [9] 翁士洪, 顾佩丽. 公共突发事件中微博谣言的机制与治理——以H7N9事件为例 [J]. 电子政务, 2015(10): 10-18.
- [10] 张琳. 探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治理——以白岩松对话钟南山为例 [J]. 声屏世界, 2020(5): 125-126.
- [1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标准 [EB/OL]. (2018-10-15) [2020-03-25]. http://www.chinacdc.cn/jkzt/tfggwssj/gj/201810/t20181015_194984.html.
- [12] 新华社.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EB/OL]. (2020-01-31) [2020-03-25]. http://www.gov.cn/xinwen/2020-01/31/content_5473297.htm
- [13] 樊亚平. “非典”事件中的误解性谣言 [J]. 新闻记者, 2003(6): 15-16.
- [14] 周裕琼. 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20.
- [15] 周晓虹. 传播的畸变——对“SARS”传言的一种社会心理学分析 [J]. 社会科学研究, 2003(6): 43-54.
- [16] 人民日报. 扩散周知! 防范新型肺炎48字守则 [EB/OL]. (2020-01-22) [2020-03-25]. https://mp.weixin.qq.com/s/VP62EdgyUZfORY_dKpi5Kw.
- [17] 清博指数. 微博传播指数BCI (V9.0) [EB/OL]. (2016-03-18) [2020-03-25]. <http://www.gsdata.cn/site/usage-2>.
- [18] David N. Rapp. The Consequences of Reading Inaccurate Information [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6, 25(4): 281-285.
- [19] 艾瑞咨询. 2019年中国短视频企业营销策略白皮书 [DB/OL]. [2020-03-25]. <https://www.iresearch.com.cn/m/Detail/report.shtml?id=3504&isfree=0>.
- [20] 硬核看板. 一个科普视频涨粉320万! 回形针是怎么做到的? [EB/OL]. (2020-02-03) [2020-03-25]. <https://mp.weixin.qq.com/s/NReCnJPpGjGul66CLM5FQ>.
- [21] L. 科塞. 社会冲突的功能 [M]. 孙立平,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编辑 颜 燕 袁 博)

(上接第38页)

参考文献

- [1] 郝倩倩. 科普短视频在应急事件中的传播分析——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J]. 科普研究, 2020(5): 23-31.
- [2] 陈瑶. 健康传播类短视频传播效果分析——以“抖音”平台健康传播短视频为例 [J]. 视听, 2020(4): 159-160.
- [3] 张佳. 健康传播在短视频平台中的现状及发展探讨 [J]. 传播力研究, 2019(21): 92-94.
- [4] 徐萌. 疫情语境下医学科普短视频大众化传播策略创新——以“丁香医生”抖音号为例 [J]. 传媒, 2020(18): 38-40.
- [5]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 (2015年版) [J]. 中国健康教育, 2016(1): 94-95.
- [6] 杨圣琪, 丛挺. 基于抖音的知识短视频类型研究 [J]. 出版参考, 2020(1): 48-50.
- [7] 卡尔·霍夫兰. 传播与劝服 [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
- [8] 罗永雄. 意见领袖: 理论缘起及其在劝服传播中的影响分析 [J]. 新闻知识, 2012(4): 19-20.

(编辑 颜 燕)

Analysis of Circul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Rumors on Weibo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 Case Study of COVID-19 Epidemic

Chen Denghang¹ Tang Shukun²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¹

(Research Center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²

Abstract: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spread of rumors on Internet and the occurrence of gathering behavior, which may endanger public security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 public emergencies, the author established a database using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a Sina Weibo official account 'Weibo Rumor Refuting' from January 19 to February 19, 2020. Nvivo was used for data coding and analyzing, by which it was found that rumors circulating in public emergencies bear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ization and high reproducibility, and could be disguised as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an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eculiarities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mproving the communicating mode of refuting rumors, regenerating expression strategy of refuting rumors and establishing communicating mechanism with rumor-involved Web-bloggers are key measures to be taken to reconstruct social order and help to repair social trust in a risk society.

Keywords: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umor on Weibo; circulation features; rumor refutation; COVID-19

CLC Numbers: G206.3; N4 **Document Code:** A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21.01.005

Review of Science Game Research

Xu Jingran Zhang Zengyi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Abstract: As a combination of science and game, the science game is not only a new direction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but also a new hotspot in the new field of game. By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science game in major Chinese and English journals, this paper first classifies the materials studied into themes, and then analyzes and comments on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and their progresse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ory, design and function of the science game.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 of future research,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ideas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game in China.

Keywords: science game; science communication; game

CLC Numbers: N4 **Document Code:** A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21.01.006